

● 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
主 编 吴国华 王铭玉 副主编 赵蓉晖



● 杨仕章 ⊙ 编著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

主 编 吴国华 王铭玉
副主编 赵蓉晖

语言翻译学

杨仕章 ⊙ 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翻译学/杨仕章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

ISBN7-5446-00131-9

I. 语… II. 杨… III. 俄语—翻译—研究

IV. H3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427 号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助项目

第 200313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徐国华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8千字

版 次: 2006年 9月第 1版 2006年 9月第 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5446-0031-9 / H · 0010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一

吴国华同志是全国外语界第一位“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他用教育部为此而提供的专项资金汇集一批专家编写出一套“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共分六部:《功能语言学》、《工程语言学》、《口语学》、《语言文化学》、《语言翻译学》和《人文修辞学》。这六部著作涉及当前俄罗斯语言学最具世界影响的六个学术领域。在付梓前得以拜读,获益良多。这套丛书对相关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

王铭玉等编著的《功能语言学》论述了俄罗斯及世界功能语言学的源流、发展和区别,尤其对俄罗斯功能语法各种流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全书共六章,其中用五章分别介绍了彼得堡功能语法学派邦达尔科的语法理论、佐洛托娃的交际语法、弗谢沃洛多娃的功能—交际句法、塔尔图大学教授舍利亚金的功能语法及梅里丘克的《意思—文本》模型理论。当代俄罗斯的功能语言学有其独到的特点,在许多方面可以与西方和中国的功能语言学相互借鉴。

易绵竹等编著的《工程语言学》着重分析了圣彼得堡工程语言学学术中心和计算机语言学创始人皮奥特罗夫斯基在语言学、符号学、信息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言语的统计组合描写与文本的自动处理、机器翻译和语言教学的计算机优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还介绍了莫斯科学术中心梅里丘克倡导建立的《意思—文本》语言学模型理论及其学术思想(参看《功能

语言学》第六章梅里丘克的《意思—文本》模型理论)。相信,这对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学术成就以推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机器翻译研究及近年发展起来的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建设与词典编纂、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等都会是十分有益的。

赵蓉晖等编著的《口语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口语学概论(第一章);第二部分为俄罗斯口语学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具体又分:达里和俄罗斯民间口语研究(第二章)、雅库宾斯基和对话言语研究(第三章)、科仁娜和功能修辞学派的口语研究(第四章)、西罗季尼娜和萨拉托夫学派的口语研究(第五章)、什维多娃的口语学思想(第六章)、拉普捷娃和普希金学院的口头言语研究(第七章)、泽姆斯卡娅和科学院学派的城市口语研究(第八章)。

彭文钊等编著的《语言文化学》从语言国情学到语言文化学的建立谈起,描述了语言文化学的发展历程,对语言文化学对象和任务、研究方法论(第一、二、三章)等做出了说明。全文第四、五、六章分别介绍了沃罗比约夫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普罗霍罗夫的社会文化定型理论、科斯托马罗夫的语言信息单位理论、克拉斯内赫与库德科夫先例现象研究。特别是最后还拿出一部分章节对隐喻、象征与文化伴随意义、语言图景作为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空间关系的认知语义等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杨仕章编著的《语言翻译学》以翻译学的理论和语言翻译学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对翻译与翻译学、翻译过程、翻译单位、翻译标准及翻译的技艺进行了论述。尤其是语言翻译学的基本理论一章概括了翻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翻译的语义研究、翻译的语用学研究、翻译修辞学研究、翻译的文本学研究、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问题。

樊明明等编著的《人文修辞学》由两部分组成:俄罗斯现代人文修辞学简史及学科综述、俄罗斯现代人文修辞学主要流派及观点。前者论述了俄罗斯现代人文修辞学简史及俄罗斯现代人文修辞学概况,后者论述了莫斯科大学学派、莫斯科师范学院学派、莫



斯科国际大学学派、彼尔姆学派、克拉斯雅尔斯克学派、萨拉托夫学派、沃罗涅什学派及叶卡捷林堡学派主要流派的观点。

综合来看,这套丛书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把各门学科的对象、方法、任务总结出来,使我们对该学科有一个了解;第二,该丛书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学派的观点,使我们能了解各学派之长。这一浩繁的工作来之不易,意义重大。为此,我们应该感谢这套丛书的作者。

王福祥

2005年7月12日

序二

我国的“外国语言学”，就研究的对象而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国的语言（英语、俄语、日语等）的研究，一个是对外国（英国、俄国、日本等）如何研究语言的研究。这后一种研究属于宽泛的“语言学史”的范畴。以史为鉴，国外语言研究中提出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在了解和吸收其中的精华之后，可以为我所用，用来改进我们的语言研究。“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分国界的，各国的语言学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才能共同为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前苏联的语言研究状况是比较重视的，对他们的有影响的语言学家、语言理论、研究方法等都做了许多介绍和评论。之后我们关注的重心就逐渐转向了欧美，对前苏联和俄罗斯语言学的了解就比较隔膜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和特色，我对俄罗斯的语言研究状况知道得很少，不敢妄加评说，只是印象中他们词汇学的研究特别发达，对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很深入，但是我相信，有悠久传统和富有特色的俄罗斯语言学一定有许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研究和借鉴的方面。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是我国俄语学界近年来一些年轻有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浏览了一遍书稿，发觉俄罗斯现代语言学的内容确实很丰富，涉及语言学的方方面面，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当代的特色，有许多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我们如果眼睛只盯住欧美，忽视

了俄罗斯,那我们的外国语言学研究就有很大的缺陷,因此要感谢这套丛书的主编为我们了解现代俄罗斯语言学提供了方便,我也期望今后能见到更多的研究、介绍、评介俄罗斯现代语言学的著作问世。

沈家煊

2005年7月18日



俄罗斯语言学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语言学流派更是异彩纷呈,研究成果丰硕,发展势头强劲。但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和外语学界对俄罗斯现代语言学诸分支学科的理论成就还相当陌生,这不能不说是中西文化贯通中的一个缺憾。为此,我们组织了16名学有所长的博士,用了3年时间展开了“俄罗斯现代语言学”课题的研究工作,集中精力梳理了俄罗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客观评介了俄罗斯现代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的学术地位,勾勒出了俄罗斯现代语言学的学科概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6个既有俄罗斯特点又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学研究领域进行重点挖掘,其成果形成了目前这套“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该专著由6个分册组成,分别是《功能语言学》、《工程语言学》、《口语学》、《语言文化学》、《语言翻译学》和《人文修辞学》,全书共计约150万字。

“俄罗斯现代语言学丛书”是我国俄语界第一套较为系统全面引介并阐释俄罗斯现代语言学思想的著述。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注重前沿。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俄罗斯语言学一直是一支生力军,对人类语言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功能语言学的多元化进程,工程语言学的模型化构筑,口语学的多维探索,语言文化学的独创精神,语言翻译学的交叉融合,人文修辞学的推陈出新,无不反映俄罗斯语言学的与时俱进主旨,体现前沿性的思想精髓。所以,这套丛书的推出是对世界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2)突出特色。俄罗斯语言学研究历来有自己的传统,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排斥外来思想的融入,但总的说来,俄罗斯语言学有一定的“原生性”,其主要思想渊源是自己先辈思想的自然延伸,其发展道路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道路并不完全相同。我们选定的6个学科正是最具俄罗斯语言学特色的学科,是一套独具风味的“俄罗斯大餐”,相信它对中国和西方语言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3)坚持客观。我们的研究所遵循的方法是:以某一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流派为纲,广泛搜集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经典论著和相关文献,通过仔细研读原著原文,理清各学派的起源、分期、研究方向、代表人物等有关学科发展背景的线索和脉络,原汁原味地提取各学派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对各流派思想的优缺点进行客观评述,并最终形成该研究领域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4)体现浓缩。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丰富多采的,想通过一本书“和盘托出”是非常困难,也是不可能的。但为了方便读者,使其在有限的时间时能够“窥其全貌”,我们纵横兼顾,既有对学说史的挖掘,更注重对现代思想进行缩微式聚合分析,力争达到纲举目张之目的。

当然,囿于有限的学术水平和视野,在这套丛书中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甚至谬误之处,我们真诚地恳请语言学界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吴国华 王铭玉

2005年7月6日



绪 论

第一章 翻译与翻译学

- 14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与分类
- 22 第二节 可译性问题
- 31 第三节 关于翻译学

第二章 语言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 41 第一节 翻译是语言研究的客体
- 49 第二节 翻译理论的语言学基础
- 59 第三节 翻译理论的地位

第三章 语言翻译学的基本理论

- 67 第一节 翻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 71 第二节 翻译中的语义问题
- 79 第三节 翻译的语用学研究
- 91 第四节 翻译修辞学研究
- 96 第五节 翻译的文本学研究
- 101 第六节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第四章 翻译过程

107 第一节 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

113 第二节 翻译过程的描写

第五章 翻译单位

127 第一节 翻译单位的概念

129 第二节 六个层面的翻译单位

139 第三节 恒定的翻译单位

第六章 对等·对应·等值

第七章 翻译标准

171 第一节 翻译的五条标准

174 第二节 翻译评价

第八章 翻译的技艺

181 第一节 文本类型和语句种类

186 第二节 语体与翻译

194 第三节 语言的转换

244 外国人名索引

247 参考文献

绪 论

“语言翻译学”(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是俄罗斯著名翻译学家科米萨罗夫(В. Н. Комиссаров)近年来正式提出并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是现代翻译学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的一个流派。自1953年费奥多罗夫(А. В. Фёдоров)出版《翻译理论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及俄罗斯语言翻译学正式确立以来,该学科已经走过50余年的路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学科的名称也由“翻译的语言学理论”(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翻译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演变为“语言翻译学”。

语言翻译学是俄罗斯翻译学派(переводоведческая школа Росси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流派(特别是文艺学派)一起,为世界译坛做出巨大贡献。

一、俄罗斯翻译学派对世界译坛的影响

俄罗斯现代翻译理论对中国、东欧和西方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先看对中国的影响。“文革”前,苏联翻译理论几乎成了中国翻译研究唯一的借鉴与学习对象。在学术期刊上,人们多以翻译形式大量介绍苏联翻译理论家的思想。除此之外,还翻译了苏联几本重要的翻译理论著作,如费奥多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李流等译,1955年),索博列夫(Л. Н. Соболев,旧译索伯列夫)的《俄法翻译的基础》(Пособие по переводу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一书的节译本,郑昌荣译,1958年),《文艺翻译问题》(Вопрос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论文集的选译本,李石民等译,1959年),莫罗佐夫(М. М. Морозов,旧译莫洛佐夫)的《文学翻译问题》(Пособие по переводу,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教研

组译,1959年)。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在引进、介绍欧美翻译理论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苏联、俄罗斯的翻译思想。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加切奇拉泽(Г.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卡什金(И. А. Кашкин)、利沃夫斯卡娅(З. Д. Львовская)、科米萨罗夫、柳比莫夫(Н. М. Любимов)、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Л. А. Черняховская)、明亚尔-别洛鲁切夫(Р. К. Миньяр-Белоручев)、托佩尔(П. М. Топер,旧译托贝尔)等著名翻译学家的代表著作与理论观点都得到或详或略的介绍。学者们还探讨了俄罗斯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等值思想的演变、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的争论及各自的特点等。此外,苏联翻译理论中一些新的代表性著作也被译介到了中国,如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蔡毅、虞杰、段京华编译,1985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 蔡毅、虞杰编译,1987年)。

苏联、俄罗斯的翻译理论思想对我国翻译研究以及俄语翻译教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不仅如此,俄罗斯翻译学派也被我国翻译理论界公认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流派。譬如在许钧先生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中,就包含《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2000年)一书。

再来看看俄罗斯翻译学派对东欧的影响。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对翻译(主要是文艺翻译)的理论问题产生兴趣。起初,他们的研究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后来受到苏联影响,于是纷纷对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原则做出回应。

捷克语文学家列维(И. Левый / J. Levý)在1974年出版的《翻译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一书中,高度评价苏联翻译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思想果实,例如:任何文学作品原则上都是可译的;译者必须给自己提出作家的任务,即不仅研究原作,还要研究生活本身;在文艺翻译中,文

学、艺术方面重于语言学方面。

斯洛伐克学者波波维奇(А. Попович / A. Popovič)在翻译理论构建原则上坚持文艺学派观点。这体现在他的著作《文艺翻译问题》(Проблем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1980)之中。有意思的是,该书的简介便带有一定的论战性:“在本书中,作者克服语言学角度研究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努力建立严谨科学的文艺翻译理论。”(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东德学者卡德(О. Каде / O. Kade)在《论翻译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问题》(载《翻译工作者札记》第16期,1979年)一文中指出,翻译的符号学与微观语言学研究应是更广视角研究的一部分。他称这一视角为宏观语言学视角。它应当考虑翻译过程中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的相互作用,并特别注意翻译这种言语活动形式的社会方面及其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卡德得出的翻译理论具有宏观语言学性质这一结论,同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1975)中得出的结论非常相似。顺便指出,《语言与翻译》这本著作曾在1979年由俄罗斯进步出版社译成德语出版,书中增加了一些德语材料。

保加利亚的女学者利洛娃(А. Лилова)在1981年出版了《普通翻译理论概要》(Увод в общата теория на превода, 俄译本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ую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 于1985年出版)。该书无论在理论兴趣方面还是方法论原则上,都与苏联翻译理论家们的著作很相似。利洛娃对苏联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间的争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主张将这两派的观点综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翻译理论,即建立一门独立的科学。该科学既不属于语言学范畴,也不属于文艺学范畴,但是却运用语言学和文艺学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控制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

利洛娃在自己的著作中,借鉴苏联文艺学派代表人物加切奇拉泽关于“原作的艺术现实”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改造,提出“双重反映”论:一是反映原作所体现的现实,二是反映原作本身。不过,在分析苏联翻译理论家的思想时,利洛娃引用更多的是费奥

多罗夫的观点。托佩尔在为《普通翻译理论概要》所写的前言中指出,“利洛娃认为自己是苏联翻译理论学派的继承者”。(Лилова, 1985:14)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苏联翻译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实践层面上(如俄汉翻译教材的编写),理论层面上则是引进介绍多于消化吸收,那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则大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学者们大量借鉴吸收苏联翻译思想,不同程度地参与苏联译坛上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的苏联翻译理论所借鉴。

最后,苏联翻译理论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也有着某种影响。

西方翻译理论只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才有了重大进步。在这一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也存在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这两个派别,只是它们不像当时的苏联翻译理论界那样尖锐对立罢了。不过,苏联关于文艺翻译构建原则的争论,在西方学者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卡里(Э. Кари / E. Cary)称这场争论为“文艺学家与语言学家的争论”。他在《苏联翻译理论》(*Les théories soviétiques de la traduction*, 载《巴别塔》第三卷,1957 年第 4 期)一文中,表达了对文艺学原则的支持。但是两年后,他又发表《翻译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à une Théorie de la Traduction*, 载《巴别塔》第五卷,1959 年第 1 期)一文,承认将文艺学原则同语言学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也是可能的。

尽管俄罗斯翻译学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成就并没有及时、完整地为世界所知晓。“应当承认,我国作者的许多著作虽然包含大量独特、有效的理论思想,但是它们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Комиссаров, 2002:4)可以提及的一个例证是,原西德最著名的翻译学家威尔斯(В. Вильс / W. Wills)在自己的著作《翻译科学:问题与方法》(*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robleme und Methoden*, 1977)中概述翻译理论的构建原则时,就对苏联翻译理论家们的著作不甚了了。(Комиссаров, 1990:30)

二、俄罗斯语言翻译学形成的背景

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翻译研究者和批评家在研究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采用综合方法,将语言学和文艺学融为一体。准确地说,他们不曾试图将翻译研究分成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并分别进行研究。当时,只有一些英俄和德俄科技翻译方面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才具备语言学基础,具有纯语言学性质,如列茨克尔(Я. И. Рецкер)在 1934 年出版的《科技翻译方法》(*Методик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莫罗佐夫在 1932~1936 年出版的《英俄科技文献翻译技巧》(*Техника перевода научно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усский*)。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真理报》举行著名的语言学辩论(1950 年 5~6 月)之后,语文学思想开始明显活跃起来。于是翻译问题也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和学位论文。它们既提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也提出翻译的文艺学问题。除了这些文章和学位论文,还出版了一些翻译著作(包括论文集)。在这些著作当中,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出一种倾向:先是区分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接着将这两个学派对立起来。

有意思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在探讨文艺翻译时,也存在文艺学角度和语言学角度之分。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是卡里在 1956 年出版的《现代翻译》(*La traduction dans le monde moderne*),后者的代表性著作是穆南(Ж. Мунэн / G. Mounin)于 1955 年出版的《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然而不同的原则方法,并没有像同一时期苏联翻译理论界那样彼此尖锐对立,争论激烈。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论文甚至出现在同一本论文集当中。1959 年出版的《论翻译》(*On Translation*)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学者认为,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所以会在苏联展开激烈争论,是因为较之西方国家而言,俄罗斯的文化更加怀疑技术主义的拯救力。(Топер, 2000: 165)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和西方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步

